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4.012

重构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

——基于日本宇野学派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

尤 歆 惟

(北海道大学 经济学院, 日本 札幌 060-0809)

摘 要: 关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问题, 马克思的论述存在二重内涵, 因此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 一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二元化理论路径, 在构建一个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理论基础上, 再构建关于资本的理论, 这其中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存在断裂的。另一种则试图将货币和资本的逻辑统一起来, 构建资本中心主义的市场理论, 实现一种对资本主义的一元化理解。日本宇野学派是此理论代表, 然而宇野弘藏本人的理论存在着货币和资本的二元关系的残留。宇野学派第三代学者小幡道昭发展了宇野学派的价值形式理论和货币理论, 提出了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模仿性、商品世界中存在的“时间的环节”、价值的“种”的属性等新观点, 成功地建立了一套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 实现了对货币向资本转化理论的重构。

关 键 词: 货币; 资本; 宇野学派; 商品流通

中图分类号: A 81; F 0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58(2019)04-0412-07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oney to Capital

——Based on Uno School's Capital-led Market Theory

YOU Xin-wei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 060-0809, Japan)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 Marx's discussion has two connotations, thu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One is about the dualistic theoretical path of capitalism, i. e.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market theory of monetary centralism, in which the transition of money to capital is theoretically broken. The other is that we should unify the money and capital logically, so as to construct a kind of capital-led market in theory. This is the monistic way in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The Uno School in Japan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ter one.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 du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money and capital in Uno Kozo's theory. Obata Michiaki,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Uno School, developed Uno Kozo's theory about the form of value and money with his theory of the imitation in commodity exchange, the time in commodity world and the species of value, in which way he re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oney to capital successfully.

Key words: money; capital; Uno School; commodity circulation

收稿日期: 2019-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7CZX008)。

作者简介: 尤歆惟(1988-), 男, 江苏扬州人, 日本北海道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问题是《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同把握方向。如果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间断性的,那么货币和资本将构成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资本主义将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社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具有一个一贯的资本逻辑。如果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连贯的,那么资本主义就能够被理解为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一元主义社会。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把握,意味着我们是否承认资本主义具有一个统一的资本逻辑。宇野学派学者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是后一种思路的最新的代表性成果。本文的写作目的,即阐明以上两种理论路径的不同,并基于宇野弘藏的资本观和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论述一种全新的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货币向资本转化论述中的二重内涵

要深入研究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首先需要考察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在公式上表现为 $W-G-W$ 和 $G-W-G$ (“ W ”表示商品,“ G ”表示货币)。前者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后者则是资本的流通。在前一种形式中,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在 $W-G-W$ 这种流通过程中,流通实质上一次性就结束了,通过货币联结的两极是两个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但是在 $G-W-G$ 这种流通过程中,通过商品联结的两极却是在质上完全一样的东西。马克思指出:“ $G-W-G$ 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因此,这个过程完整形式是 $G-W-G'$ 。”^{[1]176} 马克思对两种流通形式的区分,可以说是对货币和资本所具备的不同流通方式的经典区分。

不过,马克思虽然对货币的流通形式和资本的流通形式作出了区分,但在区分的同时他并没有探讨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的第二节“总公式的矛盾”和第三节“劳动力的买和卖”里,马克思通过引入了劳动力

的商品化,为资本的流通 $G-W-G'$ 找到了实体性的依据,劳动力的商品化使资本流通 $G-W-G'$ 在真正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这样一来,似乎意味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就是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关键。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出: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分水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市场,一种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另一种是资本主导的流通市场,两者分别以 $W-G-W$ 和 $G-W-G$ 这两种形式为自己的流通原理。

但是,马克思在别的著作中也给出了不能支持这一推论的论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的开端部分,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时认为,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的话,在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行为过程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同一的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2]202}。即是说,马克思并不承认有一种普遍存在的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关系在历史上只是部分地、偶然地出现。另外,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时,马克思指出:他们“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2]204}。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关系和以资本为主导的商品流通关系,与其说是两种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不如说前者是资本主义的“观念的形态”,后者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形态”,两者不是在时间或空间序列上并列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中:现实世界只存在一种商品流通,即资本主导的商品流通,而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规定”,却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的形态”,以至于一方面让资产阶级辩护者借此来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让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诉之于它来寄托摆脱资本主义的愿望。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论述中包含有二重内涵:一是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需要引入劳动力的商品化作为资本实现其实体性依据的契机,这一点似乎构成货币向资本转化时的一个断裂;二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基于货币流通的简单经济关系,而是基于资本流通的发达经济关系,因此现实中只存在一个普遍的商品流通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关系。然而,这

两点的融合似乎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货币和资本之间存在的断裂,那么就需要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元化理论把握;或者为了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元化理论,我们就必须面对货币和资本的断裂难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留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

二、二元化的理论路径:货币世界和资本世界的分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关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问题存在着一种理论路径,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间断的,这种理论首先构建一个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理论,进而基于这个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构建关于资本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货币、资本两个层次的世界。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二元化的理论路径。这种理论路径以日本学者平田清明、山田锐夫和中国学者韩立新的理论为代表。本文首先尝试简要阐述这种理论的基本思路。

韩立新基于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的考察,认为其中“《货币章》的理论世界是市民社会,《资本章》的理论世界是资产阶级社会”。“所谓市民社会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平等的市民自由地交换其商品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是交换价值和货币。从内容上看,它与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相似。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是资本,社会也因此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大阶级。”^[3]也就是说,关于近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按照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雇佣关系,区分出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层次。

在以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即市民社会中,产生了基于物的独立化的异化现象。本来物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依赖关系,但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的生产目的变成了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货币,也就是说,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纽带。结果是产生了“中介物的独立:货币成为上帝”^[3]。而物的独立所生成的最终成果是物的世界体系的形成:“金银这样的‘物(ding)’是上

帝;商品这样的‘物象(sache)’是平民;而‘人格(person)’则变成了奴隶。”^[3]而以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简单商品流通的世界里的。在资本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尚未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商品流通已经独立形成了一个“物的世界体系”的异化世界了。

接着,资本的形成,要理解为建立在这个以货币为中心的“物的世界体系”之上的更高维度和更深层次的异化的结果。这就需要引入“领有规律的转变”的理论。领有规律的转变,指的是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领有规律,向资本主义的领有规律的转变。韩立新指出:“‘领有规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领有规律’,即‘第一条领有规律’。它是指劳动者所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即‘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领有规律’,即‘第二条领有规律’。它是指劳动者不所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和所有的完全分离’,甚至出现‘劳动等于创造他人的所有,而所有等于支配他人的劳动’的状况。这两条规律在性质上完全相反。”^[4]伴随着第一条领有规律向第二条领有规律的转变,以货币为中心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货币向资本过渡的关键,即劳动力商品化和劳动与所有的分离所导致的领有规律的转变。而随着领有规律的转变,所有权的正义性也就转变成了非正义性。

这样一种理论把握方式是对货币向资本转化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理论路径,特别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条理论路径也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首先,作为一种二元化理论,它难免存在着将资本主义分成两部分,将其一部分赋予积极意义、一部分赋予消极意义的情况;但如果说现实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需要统一地去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其次,这种理论由于首先确立了一个以货币为中心的简单商品交换世界,因而它会倾向于先建立一个以分工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交换理论,然后才建立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但这样一来,就要面对以“转形问题”为代表的比较棘手的二重价格理论问题。最后,美国学者莫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指出,通过劳动构筑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恰好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5]。按照这一观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要从劳动本身开始。

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构建将劳动这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都统摄到资本主义逻辑体系中去的理解路径,这也需要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元化理解的理论。

三、不同的思路:宇野弘藏的资本观

日本的宇野弘藏所创立的宇野学派的理论,是当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一元化理解的重要成果。宇野弘藏的资本观,为理解货币和资本的转化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在宇野弘藏看来,资本的逻辑必须通过商品—货币—资本这样一个流通领域的链条得到;劳动生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并不构成资本的积极根据;相反,劳动要被纳入到资本的一元化逻辑体系中,才能加以理解。在宇野弘藏的原理论体系中,劳动并不拥有理论上的主体性位置^[6]。资本的根据在商品交换的交换关系中,商品交换通过价值形式的理论过渡必然发展为货币,而货币也必然发展成为资本。

关于商品向货币的过渡问题,宇野弘藏认为:价值形式论中就应该包含着商品交换何以可能的内在契机,通过将商品所有者的交换行为引入到价值形式理论中我们可以推导出货币何以可能。在宇野弘藏这里,交换过程论作为独立的理论其意义就消极化了^[7]。接着,宇野弘藏试图通过货币职能的逻辑演化,发掘出货币内部具有的发展为资本的契机。货币首先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在履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商品流通表现为 $W-G-W'$ 这样一个形式。但在流通手段过程中,货币作为随时可以买任何东西的交换媒介,能够从流通中独立出来,“它解除了单个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制约,可以说是代表商品价值本身的价值物”^{[8]35}。这样就发展出了贮藏货币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贮藏货币职能中,货币从流通过程中被收回;在支付手段职能中,商品交换的实现可以暂时脱离货币而通过信用交易的方式事后进行货币的决算。这两个职能体现了货币从流通过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价值物的属性。以此为基础,货币发展出“资金”这个货币的新职能:货币体现的不仅仅是货币所有者对商品所有者进行商品购买的关系,还是从流通外部将货币投入到流通过程中的关系。它表现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职能,这就推导出了资本。宇野弘藏指

出:“作为商品经济的财富而被贮藏的货币,必然要用于为了卖出商品得到利益而购入商品这一行为,或者说用于财富的增殖。 $W-G-W'$ 就展开为 $G-W-G'$ 这一新的流通形式。于是货币就成为了资本。”^{[8]37-38}

宇野弘藏和马克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他强调首先要通过流通领域来定义资本一般范畴($G-W-G'$)。当资本一般通过实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而把握住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后,才实现了产业资本范畴($G-W\cdots P\cdots W'-G'$)。产业资本,显然已经涉及到生产领域,而不仅仅是流通领域的东西了。因此,宇野弘藏首先并不是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把握资本范畴的。资本一般首先是商人资本($G-W-G'$),这是最符合资本一般公式的资本形式。商人资本范畴进一步发展出了借债资本范畴($G\cdots G'$)。不过,由于这两种资本形式无论哪一种都不构成在自身内部拥有价值增值的基础的自主性运动,所以资本诉求着获得价值增值的稳定基础,这才要发展出产业资本形式。宇野弘藏强调了资本一般公式和产业资本公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以商品、货币为前提,又和这两者一道作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流通形态而出现,因而它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形态。”^[9]也就是说,资本和商品、货币同样隶属于流通过程。诚然,资本需要通过生产过程才能获得价值增值的稳定的实体性基础,但它本身建立在流通过程中,需要在流通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根据。

以宇野弘藏的观点为基础,宇野学派的很多学者都倾向于采用一种“货币增加”的思路来理解资本。比如铃木鸿一郎认为,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货币”;伊藤诚使用了“货币的自我增殖运动”这个观点等^{[10]159}。这种思路很显然是根植于宇野弘藏的基本理论的。既然资本作为 $G-W-G'$ 这样一个运动体其增殖要在流通中获得根据,那么首先最直接地看来,这个根据就来自于货币的增加,即 G 经由买入和卖出 W 增加到 G' 。

然而正是这个观点,体现了宇野弘藏理论的不完善之处。首先,货币本身具有的价值变动性问题被忽略了。由于宇野学派首先悬置了价值的实体性依据,因此在宇野学派这里,价值往往被规定为商品的交换性,但货币的交换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即存在着物价的变动问题^{[10]146}。因此,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简单地和货币的增加划

等号。

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这里货币首先已经被设定为了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的中介,仿佛货币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具有了客观性,仿佛货币的增加就是价值增殖,因而这样发展出的资本流通理论,其中却存在着货币中心主义市场观的残余。因此实际上货币和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可能的割裂: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流通的中介,这样建立起的市场是货币中心主义市场;另一方面,货币作为能够通过流通运动而实现增殖的货币,又有可能支撑起一个资本市场。这样,这种看似已经统一了的货币和资本的理论,以一个“中立”的货币范畴为中介,其中仍然潜在地蕴含着货币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两种市场观并立的二元结构。这一结果可能会导致宇野弘藏苦心建构的关于资本的一元主义理论功亏一篑。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而这一点又需要更新对货币的理解方式。这就是宇野学派第三代学者小幡道昭的工作。

四、一元化理论路径的实现： 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 市场理论

小幡道昭既继承了宇野弘藏的基本思路,又克服了宇野学派理论面临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要了解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首先需要了解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的特征。他的价值形式理论的终点即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已经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对于货币的基本观点,而这个观点又决定了他对资本的基本观点。

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是一种“他律型”的价值形式理论。小幡道昭首先通过界定欲求概念,确定了简单的价值形式的理论出发点地位;然后,他将扩大的价值形式理解为间接欲望的形式,而所谓间接欲望,即对他人的欲望进行模仿所产生的欲望;接着,他将一般价值形式理解为间接欲望得以统一的形式;最后,他将货币形式理解为统一的间接欲望统摄所有财富、给所有财富都赋予价值表现的形式^{[11]35-44}。在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构成货币生成逻辑的最重要的契机,是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一个商品所有者对另一个商品

所有者的欲望进行的模仿行为。比如说,麻布所有者对上衣所有者的上衣有所欲求,但上衣所有者对麻布并没有欲求,因此尽管麻布所有者愿意拿出一定量的麻布去交换他所欲求的一定量的上衣,但上衣所有者并不一定愿意和他交换。这个时候,麻布所有者为了让交换得以实现,就会首先试图用麻布去交换上衣所有者所欲求的商品,比如茶叶,再用茶叶去交换自己所欲求的上衣。这样,茶叶就构成了麻布所有者的间接欲望:麻布所有者并不真正欲求茶叶,但他希望用茶叶作为中介,去交换自己欲求的上衣。因此,这里的茶叶其实就是货币的萌芽状态。而随着中介的统一(比如最终不是茶叶,而是黄金,成为普遍的交换中介),货币就形成了。在小幡道昭的理论中,基于模仿的间接欲望构成了理解商品交换的核心概念。

第二,当货币产生之后,货币作为一种统一的“工具理性”,就统摄了所有的财富。人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财富,都纳入到了价值表现中来。这一点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交换从表层走向了深层,从瞬间行为走向了持续性行为。由于整个商品世界的全财产都被置于可交换的境地,因此任何交换都可以而且必然要被置于一个长期的期间中。也就是说,商品世界孕育着“时间的环节”^{[12]65}。

这两个观点的意义十分重大:商品交换是一种基于间接欲望的交换,这种间接欲望是货币生成的最重要契机,而货币又通过统摄人类的财富而形成了一个让交换走向深层和长期的价值世界,因此,货币不再简单地是某种中立的交换媒介,价值增殖也不再简单是这种中立的、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增加。毋宁说,货币和商品一起,构成价值增殖的重要环节。货币和商品交相辉映,相互表现。货币不仅可以用来购买用于消费的商品,也可以购买能够“保值”乃至“增殖”的商品;商品售出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能够购买其他消费品的货币,也是为了实现“保值”乃至“增殖”。在这一条件下,商品经济本身就具备这样一种结构,即以价值保存和增殖为目的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的最重要特征。而商品交换所孕育的“时间的环节”,让这种以保值和增殖为目的的交换成为现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如何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

果我們只是假定賣者把價值 100 的商品按價值 110 出售，那麼他作為買者又會同樣失去 10 的價值，其結果就是“全體商品所有者都高於商品價值 10% 互相出賣商品，這與他們把商品按其價值出售完全一樣”^{[1]187}；如果我們只是假設某個賣家非常狡猾，擁有欺騙買家實現賤買貴賣的特殊能力，那麼這也只是改變了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價值分配，因此無法在普遍的意義上實現商品交換的價值增殖。眾所周知，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通過引入勞動力的商品化這個“生產環節”的性質轉變來給予解決。但如果我們認同了小幡道昭對商品流通的性質的重塑，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理論上能夠首先從流通環節尋求價值增殖得以普遍實現的條件。

小幡道昭提出，價值量是一個“種”的概念。“在事物中，存在着有個性的因而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事物。這樣的事物作為商品，雖然擁有交換性意義上的價值，但沒有價值量。”^{[11]281} 獨一無二的東西沒有辦法同種比較，也就很難存在模仿性關係；而同一個“種”下的諸多相同事物，則存在着模仿性關係，因此一旦價格形成，別的同種商品就很難不向這一價格靠攏。因此，按照價值量的“種”的概念，同“種”商品之間就存在着價格的收斂關係，這種收斂關係表現為一種“帶、束”關係。這裡的所謂“帶、束”關係，“並不是以內部存在一個重心規定着單個的價格的形式形成的”^{[12]74}，即是說這裡尚不需要設定生產商品所投入的勞動時間作為規制價格重心的因素。在流通論階段，價格的“帶、束”關係是由於同“種”商品之間的相互模仿而成立的。這一點要實現，則需要一個市場內部存在着同種商品的多量庫存。而正如前文所述，商品世界本身已經孕育着“時間的環節”，即是說貨幣產生之後由於全財富都被納入到一種價值表現關係中來了，因此商品交換得以從瞬時走向長期化。交換所具有的“時間的環節”支撐了市場中同種商品多量庫存的存在。

同種商品基於相互模仿其價格所形成的“帶、束”關係，意味着同種商品的價格之間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偏離。這種“帶、束”關係，不僅意味着時間上同種商品彼此存在着價格的波動，還意味着同種商品基於空間差異的價格偏差納入主體的經驗後而呈現為時間上的偏差。宇野弘藏所設定的資本在流通領域的原初形態：商人資本（ $G-W-G'$ ），即可以納入到這個同種商品

內部所孕育的“帶、束”關係中來獲得理解。這樣，我們就能理解資本如何通過流過程而實現價值的增殖了。小幡道昭指出：“正是資本，將同種商品諸價格的帶、束結合到自己的運動過程中，因而它是字面意義上的使價值概念得以實現的主體。”^{[12]78-79} 他又指出：“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所構成的市場，伴隨着不可避免的買賣差額的產生，其內部誘發着資本家的活動，它必然發展為‘向資本出售并向資本購買’這樣一種以資本為主導的市場構造。”^{[10]138} 這樣一來，小幡道昭的理論就通過重塑流通理論而實現了在流過程中尋求貨幣向資本轉化的內在根據。

有了這一理論，我們可以得出：傳統理論所揭示的貨幣中心主義市場觀，表現的並不是現實的市場關係。傳統的貨幣中心主義市場觀，用公式來表示是這樣的： W_1-G-W_2 ， W_2-G-W_3 ， W_3-G-W_4 ，……。但現實中的市場關係，是資本主導型的市場關係，用公式表示如下：……— $G-W_1-G'-W_2-G''$ —……。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只不過是貨幣的一個消極職能，並不代表現實的流過程，但傳統的貨幣中心主義市場觀，將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誤認為是現實市場關係了。貨幣的積極職能，是形成一個資本主導的市場，在這裡，商品 W_1 所有者和商品 W_2 所有者都通過將商品賣給資本而實現商品的互換，資本利用同種商品的利差實現價值增殖，因此主導所有商品的交換關係的其實是資本（ $G-G'-G''$ —……）。因此，在小幡道昭的理論中，並不是同一個作為價值尺度和商品流通中介的貨幣既能夠支撐起貨幣中心主義的市場，又能夠支撐起資本中心主義的市場，而是貨幣概念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種資本結構，資本形態是貨幣的現實形態，而貨幣的流通手段的職能只是貨幣的消極職能，按照馬克思的用語：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是資本主義商品關係的“抽象規定”，而不是貨幣的現實的形態。

事實上，當今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採用的市場觀仍然是前一種市場觀，即貨幣中心主義的市場觀。可以說主流西方經濟學仍然在試圖將資本主義的“抽象規定”上升為資本主義的“觀念的形態”。而通過小幡道昭的理論創造，後一種市場觀即資本中心主義市場觀得以實現和完善，資本主義的“現實的形態”得以彰顯。因此，小幡道昭理論下資本中心主義市場理論的建立，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新时代所具備的創造力和生命

力的体现。

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的完成,意味着宇野学派关于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得到最终完善:我们可以在引入劳动力商品化这一个契机之前,就首先基于流通领域而建立起资本范畴,实现货币范畴向资本范畴在理论上的无断裂过渡,从而立足资本逻辑实现对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把握。这样,前文所提出的为了构建一种对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元化理论而不得不面对货币和资本的断裂难题,就得到了解决。这种解决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立场而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的更完整和更现实的把握。它修复了货币和资本的断裂,重构了传统的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重大创新,为我们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 2001.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 韩立新. “物”的胜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为中心[J]. 哲学研究, 2017(12):26 - 33.

[4] 韩立新. 劳动所有权与正义——以马克思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为核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2):87.

[5] Postone M.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6.

[6] 尤歆惟. 论《资本论》的劳动主体性问题——基于日本宇野学派的理论[J]. 天府新论, 2018(5):3.

[7] 大内秀明,櫻井毅,山口重克. 資本論研究入門[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6:60.

[8] 宇野弘藏. 經濟原論[M]. 東京:岩波全書, 1964.

[9] 宇野弘藏. 演習經濟原論[M]//宇野弘藏著作集(第 2 卷). 東京:岩波書店, 1973:222.

[10] 小幡道昭. 價值論批判[M]. 東京:弘文堂, 2013.

[11] 小幡道昭. 經濟原論——基礎と演習[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

[12] 小幡道昭. 價值論の展開——無規律性・階級性・歴史性[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8.

(责任编辑:付示威)

(上接第 372 页)

[7] 郭雪松,朱正威.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4):50 - 60.

[8] 张玉磊. 跨界公共危机与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1(5):59 - 78.

[9] 李春根,李胜. 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整体性治理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12):123 - 128.

[10] 曾凡军,韦彬. 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0,22(1):22 - 25.

[11] 周健. 以整体型政府建设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能级——基于上海市 M 区整体型政府建设的个案考察

[J]. 甘肃理论学刊, 2013(3):106 - 110.

[12] 张佳慧.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J]. 电子政务, 2017(10):20 - 27.

[13] 韩兆柱,于均环. 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比较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8, 20(5):45 - 52.

[14] 黄滔.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相关理论的比较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176 - 179.

[15] 张鹏,郭金云. 跨县域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四重挑战与行动逻辑——以浙江“五水共治”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9(5):497 - 503.

(责任编辑:付示威)